

東北淪陷史研究

'96

創刊號

DONGBEILUNXIANSHIYANJIU

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6年创刊号

目 录

发刊词 (1)

祝贺《东北沦陷史研究》创刊〔日〕西田胜 (3)

关于东北沦陷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吕钦文 (5)

历史反省与“光明的日本” 王维礼 程舒伟 (8)

日本遗族会及其战争观 王希亮 (16)

· 九·一八事变研究 ·

日本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策划 赵冬晖 (21)

宇垣一成和九·一八事变 郎维成 (26)

· 伪满政权研究 ·

伪满中央机构变革述要 张辅麟 (31)

东北沦陷时期的日伪警察统治 霍燎原 (37)

· 移民问题研究 ·

日本移民对中国土地的掠夺 张凤鸣 (44)

日本开拓团入侵辽宁省大洼县情况的调查 孙玉玲 赵济时 (48)

· 满铁史研究 ·

- 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 郭洪茂 (52)
满铁的护路防范与东北抗日武装的破路斗争 庞慧茹 (57)

· 日军细菌战·化学战研究 ·

- 论日本侵华期间的细菌战及其罪恶活动 辛培林 (62)
(附) 原日军七三一部队队员镰田信雄先生访谈录 (据录音整理)

· 海外专稿 ·

- 731 部队与埼玉鼠 ... [日] 远藤光司 野沢丈二 小谷中政树 藤谷元文 (68)

· 沦陷区文学 ·

- 李季疯和他的《杂感之感》 李春燕 (74)

· 伪满人物 ·

- 张海鹏其人 傅大中 (77)
卖国求荣的于冲汉 赵 朗 (80)

· 历史档案 ·

- 日本关东军泡制《满洲国长期肃正计划大纲草案》史料 ... 吉林省档案馆 (84)

· 研究参考 ·

- 日本民间进步人士追究日本二战期间化学战责任 刁乃莉 (94)

发 刊 词

《东北沦陷史研究》是“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主办的学术刊物。

本刊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及时刊登东北地区、全国各地及国外有关东北沦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学术信息。本刊宗旨是为推动东北沦陷史的研究，为宣传、教学、科研工作服务；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学术交流，促进东北沦陷史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东北沦陷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东北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内蒙东部及原热河地区，即日本所说的“满蒙地区”，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并直接实行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地区。其统治手段之残酷、掠夺搜刮之甚，无以复加。东北沦陷十四年，东北地区人民遭受灾难之深重，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艰苦卓绝，不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而且在日本侵华史、在亚洲和世界历史上，都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研究东北沦陷史，就是研究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的历史。打着建设“王道乐土”招牌的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实行了赤裸裸的血腥殖民统治。它的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妄图迫使中国人民成为与其“一德一心”，的“顺民”；它实施严酷的经济统制，进行残酷掠夺和压榨；推行严厉的思想统制，进行奴化教育；妄图用灭绝人性的围剿、屠杀，扑灭抗日怒火，如此等等。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种种罪行和欠下的无法偿还的历史帐，本应深刻反省，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遗憾的是，事隔半个世纪之后，那些军国主义分子仍然否认侵略，宣嚣侵略“有功”；要建立“满洲建国之碑”，为殖民主义招魂，因此，深入研究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历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谬论，是非常必要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正视历史，才能有真正的中日友好，才能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研究东北沦陷史，也是教育人民不忘历史，汲取历史的教训。十四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对于东北人民来说，是血泪斑斑的历史，亡国之恨，亡国奴之辱，永远铭刻在东北人民的心里。丧权辱国的政府实行的妥协退让政策，使东北人民吞下了国破家亡的苦果。历史再一次教育人们：民族的自立、自强，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落后就要挨打”；“忘记过去就是背叛”，这是历史经验的结晶，永远显示出真理的光辉。作为中国人，要从苦难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激发出伟大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巨大动力。只有我们伟大祖国富强繁荣，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

研究东北沦陷史，也是我们向前赴后继为祖国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学习，弘扬他们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过程。在东北沦陷十四年的黑暗岁月里，中华民族无数的英雄儿女，为了打碎殖民统治的枷锁，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在松辽平原、在深山密林、在城市乡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战斗，那种可歌可泣的爱国壮举，那种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那种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永远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深入搜集、挖掘这些生动感人的斗争业绩，宣扬这种感人肺腑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伟大精神力量！

江泽民同志说过：“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东北沦陷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在深入研究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统治十四年历史的基础上，全面深刻地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增强大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斗争中的自强不息的信心和决心；驳斥那些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谬论；探索在走向未来道路上的历史轨迹。

为此，我们强调研究内容的现实性、针对性，注重研究成果的独创性。

我们希望在这块新开辟的园地上，求实创新，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们期望在探讨问题上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我们欢迎一切关心这个刊物的朋友们，关怀我们，利用这个阵地发表研究成果并及时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真诚地感谢！

祝贺《东北沦陷史研究》创刊

西田 胜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创办的杂志《东北沦陷史研究》的出刊，我作为日本人对此表示衷心的欢迎和祝贺。

从1931年9月18日起长达13年零11个月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与殖民统治，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来说，它是不可缺少的研究对象，同时，它也是日本现代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这就是说，若把这段历史去掉，要想叙述日本现代史那是不可能的。

换言之，日本的近代史就一个方面来说，它是日本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历史，因为日本如不对亚洲、太平洋诸国和地区进行经济的、军事的侵略，这种发展是不可能达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近代史——用我们自身的形象来作比喻的话，我们自身的形象如果仅从日本方面来看，是不可能了解它的真实形象的。这是因为，只有从受日本经济、军事侵略的亚洲、太平洋诸国和地区民众的立场来看问题，才有可能接近史实。

从这个考虑出发，我们日本社会主义文学会自1989年以来，多次召开了国际研讨会，特别是与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召开了四次研讨会，而今年夏季将在长春举行第五次研讨会，并以此为基础考虑刊行日中共同的出版物。

日本人自1894年以来，在中国的所做所为是清楚的，而对我们来说则是很难堪的事情。但是，对此却不应因难堪而予以回避，而是应该断然明辨是非，这才是从过去的历史解脱出来的唯一途径。

我首次访问中国是在1984年的6月，是为了准备那年9月以今后亚洲、太平洋的和平为目的的市民运动——和平之船寻查日本过去侵略的遗迹，事先打探中国的接待事宜而访问的。那时，我们向中方团体中青联的干部提出要求，请他们把南京大屠杀为首的日本犯下的暴行的遗迹给我们看看。起初他们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重要的事情，我们认为要面向未来的日中友好”，而不愿意答应。于是，我们就详细地说明日本的现代史教育，特别是几乎不讲授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这种教育现状，因此，致使一些青年，甚至现在还在认为过去的战争失败者，并非是被称为富有的日本，而是中国。后来中方干部也说“中国青年也同样不了解

日本侵略的真相”，并同意了我们去参观过去的战争遗迹。

9月，我们共有400名市民乘船抵达了上海。在访问南京、苏州和杭州时，我们看到了中国发掘出来被惨杀的中国人的遗骨。一位女学生一边流泪一边压低声音在被惨杀的遗骨面前说：“我们根本不知道父辈和祖辈在中国干出这种事情，请宽恕我们吧！”出现了非常感人的场面。我自己虽然在书本上也曾读到了这种暴行，但读到的和亲眼看到的相比，那是有天壤之别的。

从那以后，我又多次访问了中国，并且阅读有关日中战争的书籍，但“满洲国”却是在我的视野之外的。而当1991年通过吕元明先生收到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的共同研究方案时，特别是“沦陷”一词的含义使我受到了强烈地冲击。还有，1992年在长春的研讨会上，作家梁山丁先生说“同是被占领的地方，在关内可以以中国人自恃，而在伪满洲国的我们则是奴隶”时，他的发言震动了我。“伪满洲国”这是抗拒感很强的用词，它所表达的含义，起初就字面上我怎么也理解不透，听了中国方面的报告之后，才全面地知道并理解了“满洲国”的傀儡形态及其统治的残酷性。

我是在十四五岁时通过在广告板上所贴招募“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宣传画，接触“满洲”的。与我同龄的贫苦农家的一些青年应召渡海去了“满洲”，但是，在那里的生活是很严酷的，有的自杀，也有的逃回了日本。而在学校或在家中时常听到这类的话题。因此，“满洲”对我来说，一开始就认为那里不是什么“王道乐土”，而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但是，由于直接了解真实情况的应募者，或者自杀，或者逃回日本，而逃回日本的人也没有有关这方面的谈话，所以，对“满洲”的认识，只是限于恐怖这一点而已。

多年以来，与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诸位先生多次召开研讨会，在相继阅读有关“满洲国”的研究论文、回忆录和历史资料，但对此，我还只是刚刚入门，而研究工作尚处于初步阶段。

这种状况，我想不只是我自己，这也是我们日本研究者的共同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诸位亲手创刊的《东北沦陷史研究》，对我们来说也将是非常有益的，因此，我们热情期望它的出版。我们也想在来年出版题为《“满洲文化”研究》杂志。

我认为，日中双方通过切磋琢磨，定能就有关“满洲国”的问题上取得共识，为日中友好，进而为亚洲的和平奠定一个牢固的基础。

（李茂杰译）

作者单位：日本社会文学会地球交流局

责任编辑：孙继武

关于东北沦陷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吕 钦 文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编纂工作从1986年10月开始，至今已整整十年，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去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胜利50周年前后，出了相当可观的一批研究成果。东北三省的史学工作者、档案工作者和各级领导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几位退居二线的省级老同志倾注的热情，给予的支持，尤为令人感动。应该说，准确反映、正确评价这一段长期被人冷落、忽略、疏远乃至漠视与歪曲的历史，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但却是有良知的学者、专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十年来的工作历程和丰硕成果，十年来世界形势的变幻风云，都充分说明：第一，撰写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重大价值而同时又是艰巨、浩繁的系统工程；第二，必须依靠几个省的有关人员联合攻关、通力协作，众志成城；第三，经过长期锲而不舍的努力，必将获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这叫“有志者事竟成”。

一项事业进行了十年，理应对这项工作的自身做一番认真的总结与分析。对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工作的瞻前顾后、观照全局是为了知己知彼、扬长避短，以使研究寻找到新的着眼点、生长点。这里仅就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政治热情与学术冷静。

这是一个“热”与“冷”的关系问题。

东北沦陷十四年历史，充满了日本侵略者的血腥与残酷，也浸透了中国东北人民的不幸和苦难。那是中国人不愿提起、而又不能忘却的年月。特别是由于战后日本非但对二战期间所犯严重罪行缺乏深刻反省，而且右翼反动势力更变本加厉地频频为侵略战犯招魂，演出一幕幕掩盖历史真相、否认侵略行径、大肆鼓吹侵略有理的丑剧，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乃至亚洲人民的感情。同时，也激起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强烈的民族义愤和搞好十四年史研究、回击日本反动势力的政治热情。并且使这项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的指向性。而这正是搞好研究工作的宝贵的内在动力。但是，作为一个高尚的正直的为人类负责的学者，仅仅有这种治学热情和动力还很不够，还应该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学术冷静。塞万提斯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学家的职责是要确切、真实，不感情用事；无论利诱威胁，无论憎恨爱好，都不能使他们背离真实。”这就是说，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是历史著作的价值之所在。因此必须提倡清醒的学术目光和谨严的治学态度，要讲究真实的史实，充分的论据，摒弃任何主观推断与臆想，去除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结论，使历史研究耐得住

历史的检验，学术成果耐得住学者的挑剔。近些年来，日本有一些人任意篡改、编造、掩盖历史真相，竭力为过去的侵略罪行开脱，甚至无中生有的地制造“中国威胁”的荒唐谬论。这确实应引起我们的理性警觉。人们记忆犹新，从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开始，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其间日本或是发动，或是参加的对中国的侵略行动竟有11次之多，并且至今不对战争责任深刻反省，右派势力猖獗，近日自民党又提出外国领导人访日应参拜靖国神社。究竟是谁侵略谁、威胁谁，不是昭然若揭吗？凡是篡改历史的人，必然是别有企图；凡是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复辙。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现代人以历史警戒，防止倒行逆施的历史重演。正因为如此，在研究工作中，越是这样现实性强的问题，越要注意科学性；越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越要注意学术冷静；越是争议大、分歧多的问题，越要增强学术的坚定性。这样，才能通过广大历史工作者的不懈的努力，把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历史真实条分缕析，历历在目，以扎实可信的研究成果，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使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昭然，铁证如山，无可抵赖，难以歪曲，捍卫历史的肃然与人类的正义。

二、成果质量提高与传播普及。

这是一个“上”与“下”的关系问题。

对目前已取得的有关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研究成果，作一番总体的观照与审视，在欣喜之余也同时感到有一个研究工作应再上新台阶的问题，也就是说研究水平要提升，成果质量要提高，学术与社会影响要进一步扩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重要的现实任务。但是，要真正能够把这些方面搞上去，就必须耍眼光向下，着眼于研究成果的更广泛的普及与传播。

现在有不少研究工作者，对学术观点的创新、历史史料的开掘十分重视。这当然是正确的必须的，但却常常忽略学术表达。这首先表现在研究缺乏新的观念、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方法 with 表达方式。例如，某些西方国家常常用人权来要挟、指责别人，而对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人权、灭绝人性的法西斯行径的揭露与剖析，对目前日本某些政界要员掩盖战争责任、为战争罪人开脱的违背人权、人性行为的抨击与批判，将会产生很有说服力的良好效果。其次，还表现在某些历史著述生硬、晦涩，观点语焉不详，史料陈旧模糊，文字枯燥、呆板，语言干瘪、乏味，缺乏可读性、感染力。另外，也表现在对现代传播工具、传播方式的疏离，信息社会的传播媒介多种多样，史学工作者要善于借助覆盖面广、传播快捷、影响力强的影视、戏剧、报刊及国际互联网络等载体转化、传播自己的史学研究成果，以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这里有一个需要转变的观念，就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也应该写一些学术普及性的著作。不能认为普及性著作就层次低、水平差，就没有价值。社会科学的功能、作用，既表现在知识创新、学科发展上，也表现在为政府决策服务和科学知识、优秀文化的普及方面。我们应该提倡广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工作者，包括史学研究者，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有的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反映出来，让学术走向生活，让公众理解科学。现实中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许多专家、学者的著作无法出版，而又不屑于写一些面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普及读物，把科学、规范、权威的知识内容阐释、解说、传播出去；而另一方面，一些不懂科学与历史的人，东拼西凑，粗

制滥造各种书籍、影视剧，将大量质量低劣、谬误百出甚至严重违背科学与历史真实的东西充斥于社会。这样不正常的状况应该改变。特别是史学工作者，不能囿于狭小的学术圈子，应该在潜心钻研、严谨治学、撰写规范化、学科性强的学术著作之余，为广大群众写一些权威性高、可读性强的普及读物或影视制作，这不仅能够进一步发挥学术与科学的功能作用，而且也能从中激发自己的学术热情和研究动力，同时，还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

三、着眼于外与着力于内。

这是一个“外”与“内”的关系问题。

由于日本当局一些政治家和右翼势力对待战争历史的错误态度，也使一些日本青年对战争责任失去正确的识别力和判断力。因此，东北沦陷史的研究者都有一种责任，那就是运用自己扎实有力、令人信服的观点与史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以正视听，同时驳斥日本某些别有企图的人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与言论。这样做并不是维护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恰恰相反，正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为了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的持久和平与社会发展。显然，这种着眼于“外”的工作是正确而必须的。实际上，中国学者和真正的人类责任感的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合作已取得了很好成绩，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向内，即必须提高认识，在东北沦陷史研究上着力于内。其一，要练好“内功”，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搞得更深入，水平提得更高，成果传播得更广泛；其二，要充分以沦陷史为教材，对群众、特别是向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教育，让人们了解昔日的历史风云，分清大是大非、正义与邪恶，增强民族自强、自立意识和人类和平进步思想。要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尊严、坚定不移地搞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其三，不放松对侵略战争的警惕，随时以东北沦陷的历史揭露与抨击侵犯别国主权、制造侵略战争的反动势力，促进整个人类的正义、和平与发展。

上面谈了三个关系问题，为了把东北沦陷史研究工作搞得更好，还有三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

第一，搞好人才队伍建设。要使研究队伍更加扩大，团结更多的学者（包括外国学者）从事这项工作，并不断地切磋、交流。要培养好高素质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做到后继有人，保证工作的持续开展。

第二，搞好研究规划。这样做既有利于扩大领域，填补空白，又能够避免低层次的重复劳动，有效地发挥研究人力、财力资源的价值。

第三，重视资料工作。第一手宝贵的历史资料是研究的基础，要加强对东北沦陷史各种书刊、档案、实物、图片以及口述等方向资料的搜集、抢救、整理与使用，要有计划地出版各种资料集和开展一些实证性研究。

作者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责任编辑：郑敏

历史反省与“光明的日本”

王维礼 程舒伟

“不认真对待自己历史的人，就无法理解自己现在的立场为什么是这样。否认过去的人就将冒重蹈覆辙的危险”。

——魏茨泽克（德国前总统）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世纪的各国人民，都在认真的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确立跨入廿一世纪的历史姿态。但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之一的日本国内，却出现了以右翼政客为核心的新右翼势力的猖狂活动，以奥野诚亮为会长的“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纠集了两院议员二百余人（其中自民党议员147人，占自民党议员的一半），公然打出反对“道歉”的黑旗；“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为反对道歉竟征集了近500万人在“请愿书”上签名；12个县议会通过了所谓向“战争死难者”表示“感谢”的决议；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又联合部分自民党议员组成所谓“正确认识历史议员联盟”，公开反对日本以任何形式谢罪。^①1996年6月，奥野诚亮等92名自民党议员又成立了旨在重新看待历史教育等问题的“‘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公然宣称“慰安妇问题只是商业行为”。那么，这些右翼政客们为什么敢于如此信口雌黄的颠倒是非？为什么在日本能够出现这股“新右翼主义”的逆流？他们追求的所谓“光明的日本”的实质与内涵究竟是什么？它们要把日本引向那里？这是值得中国和包括日本人民的各国人民警惕的！深入批判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扭曲历史的实质，揭露所谓“光明的日本”真实面目，应当成为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责任。

—

自民党部分议员在“‘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成立宗旨中说：“决不赞成把我国罪恶地视为侵略国家的自己虐待自己的历史认识和卑屈的谢罪外交。”^②事实非常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他们反对“谢罪”就是肯定“大东亚圣战”。前运输相江藤隆美说的更露骨：“问题是如何断定历史，否定大东亚战争就是否定宣战诏书。”^③把“宣战诏书”搬出来，作为他们肯定“大东亚圣战”的根据，这绝不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反映出这些右翼政客内心世界的真实，他们要维护“军国主义”的衣钵，认为承认侵略就是“自己虐待自己”。文部大臣岛村宜伸更公然叫嚣：“大肆争论是不是侵略，这本身就是战争。难道这不正是优胜劣败，是获胜的一方侵略对方吗？”^④用“胜者王侯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为强盗自己辩护，正是这些右翼政客的障眼法，也是他们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骗术。

日本在战后出现这股以右翼政客为核心的新右翼主义逆流的原因，其一，作为战后对日本进行占领的美国，出于冷战需要，为把日本变成反苏反共的基地，并没有认真处理战争罪

犯和军国主义分子，更谈不上肃清军国主义思想。美国为了占领的需要而利用天皇，结果，不仅天皇变成了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毫无责任，更重要的是维护了日本国体，掩饰了战争的真实，而且“对日本社会的道德产生了恶劣的影响”。^⑤许多战争罪犯在美国的包庇下逃脱了应得的惩罚。七三一部队石井等一批以细菌杀人的刽子手们，就是以细菌战的研究成果交给美国为条件，换得了赦免。^⑥其二，战后以自民党为代表的许多主要成员的“源流”，战前都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上推行过侵略政策。玉川大学教授永井清彦说：“发动战争的势力战后仍然掌握着战争的实权。”^⑦甲级战犯岸信介和贺屋兴宣等人担任首相及法相就是明证。这些右翼政客们混水摸鱼，兴风作浪。多年的军国主义教育的积淀，所谓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与自尊和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扭曲结合，正是军国主义情结不散的土壤。

二战后一个时期，即五六十年代，日本还挣扎在生存与困难之中，自身难保，而且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仍坐在被告席上，无法挺直腰杆讲话。70年代以后，日本奠定了经济大国的地位，到了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世人瞩目。日本政界要人，各种右翼势力，在“卧薪尝胆”之后，公开跳出来大放厥词，或由政要出面，或由学者撰文，或由教科书公开篡改历史，或政府官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陆续不断，并有日形高涨的趋势。在这股逆流中，右翼政客扮演着“先锋”的角色。这些政客们口出狂言，歪曲历史，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从“失言”到表示“歉意”，再被迫辞职，已经“成为日本政坛典型的‘失言三部曲’，最具特色的日本式政治文化。”^⑧这些所谓的“失言明星”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成为哗众取宠，骗取选票，攀登政治台阶的一种手段。

日本新右翼势力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三点：

第一，顽固性。新右翼势力实际上是军国主义顽症的集中体现，它们继承的是军国主义衣钵，宣扬的是皇国史观，妄图重温“大国日本”的旧梦。至今，他们还捧着天皇颁布的《宣战诏书》作“圣旨”，公然使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合理化。奥野诚亮说：“我认为，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1941年12月颁布的《宣战诏书》中表明了国家的意思。”^⑨曾经是日军大佐，自称“在过去的那场战争有侵略行为”的永野茂门，居然以“皇军”的口吻宣称：“（日本）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因此“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⑩应当指明的是，战后德国政治是在彻底清除旧纳粹的基础上度过的，即使是保守党也是由反对纳粹的人组成。战后日本，在美国包庇纵容下，不仅天皇制得以保持，而且一大批参予侵略战争的战犯被保护起来，并且以它们为纽带，形成了战后日本政治舞台上右翼势力的核心，所以他们顽固地为日本帝国招魂，兴风作浪，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美梦，就毫不奇怪了。

其次，煽动性。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使得多年来灌输的民族优越感和军国主义的余毒，加上战后经济飞速发展所展示的民族自信的扭曲结合，使得相当一部分缺乏历史自觉的日本人在认识上、情感上很难和旧的军国主义日本决裂。右翼政客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歪曲历史，大肆煽动。他们攻击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的正义性。^⑪他们无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和亚洲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所造成的几千万人的伤亡，却摆出“受害者”的可怜相，假惺惺地为原子弹的死难者鸣冤叫屈，而绝口不提为什么日本挨了原子弹。他们装出卫道者的姿态，“保卫”日本的“民族尊严”，狂叫“不能（给日本）贴残忍民族的标签。”^⑫他们猖狂的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认为“不应当束缚和约束民族的未来。”^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以欺骗手法进行煽动，宣扬国粹主义，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第三，影响力。日本的右翼势力在国内还是少数，但它们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原因是近代日本长期推行侵略政策，殖民朝鲜、入侵中国、侵占东南亚各国，几乎几代日本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各样的侵略活动。许多人的父兄和亲朋都是侵略战争的殉葬品，甚至尸骨无存或葬身于异国他乡。经过战败的巨大冲击之后，绝大多数人存在着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战后日本的特殊状况，对军国主义思想与行动，未能彻底清算，所以许多人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和加害性没有明确的认识，缺乏明确的自觉，“而往往以‘不得已’、‘没办法’这种逻辑去理解那场战争”。^⑭所以“不少日本人仍然无法摆脱与清算战前‘大东亚理念’的遗毒与包袱”。^⑮例如，1980年竖立在广岛城公园的第11连队步兵的纪念碑文中，赞扬他们是“各自勇战奋斗竭力昂扬乡土部队的名声。”广岛的护国神社中也为曾在中国、东南亚犯下许多侵略罪行的第五军团立碑颂扬，表彰他们的“赫赫战功”，“以传后世”。如果承认日本的侵略责任，那么，这些“昭和殉国者”就成为毫无意义的可悲殉葬品。这就是为什么官方支持的“遗族会”积极支持自民党中右翼势力的基本原因，这些人就成为右翼势力存在的社会基础。日本学者指出：“如果不彻底根除这种渗透于日本人心灵深处的‘英灵思想’和‘靖国思想’，日本就无法真正反省，而日本的战争也就无法了结。”^⑯

二

在日本，各式各样的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的言论，层出不穷，基本手法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侵略与“解放”。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是历史事实。他们却说：“（是中国的）排日运动”，“动摇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因而“经过几年摸索，终于找到了以战争解决高地问题的良策。”^⑰说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军首先开枪”，攻击那些正确阐述历史的日本书刊是“完全照抄了那些建立在中国主张基础上的东京审判的虚假意见。”^⑱右翼政客奥野诚亮更公开叫嚣：“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是自卫战争。”^⑲侵略者摇身一变成为“解放者”，这就是日本右翼政客的逻辑。然而，正是这些“解放者”，把中国东北变成了殖民地，傀儡政权称日本为“亲邦”（即父子之邦），甚至从日本请来“祖宗”——天照大神，建立“建国神庙”，这些“解放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南京30万军民和平顶山惨案、潘家峪血案以及“万人坑”、“无人区”、“人圈”等等无数血债历历在目；惨无人道的活人细菌实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等等，连他们的法西斯盟友也称“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肤，而具有野蛮筋骨的怪兽。”^⑳这些“解放者”，仅在泰国强迫美英等国战俘和东南亚各国劳工修建的泰缅铁路，人称“死亡铁路”（400多公里）与桂河大桥，登记在册的死亡者即达6万多人，相当于修一公里铁路死亡150人。^㉑在新加坡有5万多人被杀。越南和日本学者联合调查证实，在越南，因日军强征粮食，使越南饿死200万人。^㉒在印尼，日军的暴行很快戳穿了“解放者”的面纱，在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2月14日东爪哇的印尼人就发动了武装起义。一名印尼老兵说：“我们是为实现独立而战，我们的独立是战胜日本和荷兰后获得的。”^㉓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右翼势力别有用心的宣传，从白人统治下解放亚洲。事实上，当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使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美、英等国与中国等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这是有利于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正义行动。“把侵略国家同与之战斗的同盟国相

提并论，这种观点显然是在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开脱罪责。”²⁴

第二，殖民统治与“建设有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和朝鲜殖民统治多年，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但是，他们竟无耻的上演小丑表功的闹剧。1982年，甲级战犯，伪满五大头目之一的岸信介等公然筹划建立“满洲建国之碑”。声称，他们建立“满洲国”是想建立五族协和的理想国家，此次建碑，是要明确“没有进行过侵略的实质”，并把侵略中国东北的“理想与业绩”传给后世。²⁵曾经出任伪满洲国的日本殖民官吏，在撰写《满洲国史》中，竭力宣扬他们“创建”伪满傀儡政权的“善良动机”，“建立近代模范的王道仁政国家”的“壮举”和“忘我无私……在异国土地上努力实现王道乐土……的功绩。”甚至狂妄的吹嘘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和“奇绩”，构成今日中国建设的“楷模”等等。²⁶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实行高压统治，强逼朝鲜人“创氏改名”，即姓名的日本化而将他们彻底“皇民化”。日本殖民者特意在汉城皇宫前建总督府，以示淫威。甚至进行所谓“风水侵略”，据说为了达到永久镇压朝鲜的目的，按着朝鲜人相信“风水”的作法，把他们的“龙头”、“龙尾”、“龙穴”全部用巨大的铁桩“封死”，秘密打入“要害”。战后韩国风水研究团体，花了11年时间，甚至动用军队的地雷探测仪器，已发现150根以上。这种极端粗暴、野蛮而又幼稚的殖民手法，世所少见。时至今日，日本政府官员说什么日本吞并朝族“是在合法的方式下签约进行的”，有的说：“日韩合并是圆满进行的。”右翼政客江藤隆美甚至说：“日本殖民统治朝鲜还做了好事。”²⁷这些殖民主义者，自我吹嘘，无以复加，他们妄图为自己立“功德碑”，充分表现出他们对殖民统治的眷恋。这种军国主义情结，不过是把罪恶深重的侵略历史的包袱背在身上，终究要付出历史代价的。

第三，加害者与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发动侵略战争，加害各国人民，这是客观现实，但在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竭力煽动日本是受害者。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也感到自己与亚洲各国一样遭战争浩劫，“你我都受害”的观念相当普遍，这也是日本国内至今许多人不承认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原因之一，他们念念不忘地是原子弹的巨大灾害，吞噬了十几万人的生命；许多人丧命异国他乡，造成千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败后的种种苦难，走死逃亡，历经磨难。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长期以来，并没有把这种特殊命运同具体原因结合起来，好像不知道原子弹来自何方，好像是一场自然灾害、一场地震一样；经历了巨大冲击，遭受了很多痛苦，人们只是就事论事，但却没有具体责任者。特别是“原子弹……为日本提供一种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的辩术。”²⁸日本历届当政者对广岛、长崎原子弹“无辜受害”的渲染，更是混淆视听，用心险恶。应当指明，使用原子弹这样大规模杀伤武器，非常残酷，应该反对。在冷战时期，一些世界和平组织，出于反对霸权主义者的核讹诈，以广岛、长崎受害的事实，告诫人们反对原子战争的危险性，这是对的。遗憾的是日本的某些人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日本为什么遭受原子弹的轰炸？如果日本不侵略别人，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能导致如此结果？一位日本人提出：“由于加害他人而导致自己被害”²⁹的看法是很对的。否则，那些在战争中比日本原子弹受害者要多得多的亚洲各国受害者的历史事实就被掩盖，日本战争狂人发动侵略战争而导致日本民族灾难的罪行，也被掩饰起来。

战争的责任者是日本军国主义。他们不仅要对被侵略国家和人民负有罪责，而且要对日本民族所受的灾难负责。是他们驱使千百万日本人投入战争，为天皇“玉碎”，走向死亡；是他们搜括尽民脂民膏，把日本人推向生活的绝境。³⁰是他们在战败后，把许多日本人遗弃在异

国他乡，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剧。^②更有甚者，在冲绳的渡嘉敷岛上，战败后有329人在军队的逼迫下“集体自杀”，其中包括7名来自朝鲜的“慰安妇”。据冲绳基督教短期大学名誉教授金城重明在《“集体自杀”铭刻在心》一书的记述：“我们这些居民把杀人的手伸向了亲人。那是阿鼻地狱的惨状。居民们用剃头刀或镰刀割断动脉，用绳子勒脖子，用棍棒和石头砸脑袋……。在我伸出手去杀自己的母亲时，我悲痛欲绝，发疯似地嚎叫。”而日本军的队长却带着500名士兵投降。^③

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这是事实。但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片面歪曲、恣意夸大“日本是受害者”的渲染，他们却忘记了“有一个基本观念必须搞清楚：发动侵略战争的代价与争取和平的代价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的损失是它发动侵略战争的代价，而亚洲各国在二次大战中的损失是争取和平的代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④日本人民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第四，反省与“外压”。日本一些政要的否认侵略言行，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韩国、朝鲜及亚洲各国的批评与揭露。在这样形势下，日本的“失言大臣”被迫辞职；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的事实，不得不写进去；政要们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有所收敛，……这本来是正常的，但右翼势力却称之为“外压”。他们以“捍卫民族自尊”的勇士的姿态，公然跳出来反对。既要掩饰过去，又装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却不许人们揭其疮疤，这就是右翼分子的基本心态。事实上，日本右翼政要们绝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他们反对严肃地历史反省，就是要为日本军国主义洗脱罪责，还要重建日本人的“信念”，重新以“武士道”精神来“激励”后人，从而为其修改和平宪法，自卫队出兵海外大造舆论，以实现其由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到军事大国的美梦。

三

历史，是每个民族自己走过来的。严肃、认真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于确定自己现在的立场和未来的走向，都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直面历史，放眼未来，应当是每个严肃的政治家的郑重态度。战后，在日本围绕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责任问题的各种论调，不仅是对历史评价的一场论争，实际上是关于日本前途的大论战。右翼政客们对此十分清楚，他们认为认真的反省侵略罪行，不仅关系到现在日本的“贡献”，而且给国家前途留下严重的“祸根”。^⑤所以，他们正是为了“光明的日本”，才在战后50周年掀起一个美化战争，否认侵略罪行的高潮。

侵略国家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由于历史站位的不同，他们的感受、视角都有很大的差异。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对于千千万万中国人被害的事实，只是抽象的听说过传闻，对于那些参加了战争的士兵来说，他们往往想到是执行命令或“战争的需要”，或者自己父兄战死的悲痛。所以，他们很容易被靖国神社的香火以及其他倒转历史年轮的活动所迷惑、利用。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军国主义”不是抽象的概念和数字，那是烧杀淫掠，是亲人的被害，是血迹斑斑的“万人坑”，是毫无人性的活人细菌实验，是慰安妇的痛苦呻吟，是亡国奴的生活等等血淋淋的具体事实。如果以“安慰”二百万在侵略别国中战死的“英灵”而不揭露侵略历史的疮疤，它可以迎合某些人的落后心理，却实实在在地掩盖了真正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的滔天罪行。在这里，引导并教育群众，认真进行历史反省，提高人们的认识，具有

特别重要作用的政府和有权有势的政治领导人，德国和日本对侵略战争认罪态度的根本差异也正在这里。

二战结束后的初期，德国人并不是那么愿意承担罪责的。1950年前后，大多数德国人认为自己是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受害者，是它们把德国拖入深渊。然而，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主张德国应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全面承担责任，与西欧修好。在他领导下对欧洲邻国和犹太人做出了一系列谢罪与修好工作。到60年代末，二战中和二战后出生的青少年，都了解德国犯下的罪行，并对此深感震惊，从而在否定法西斯过程中，和平与自由的价值观，日益深入人心。70年代，社会民主党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姿态，极大地教育了广大群众。两德统一之后，科尔总理努力同东欧修好，在与波兰签订的友好条约中承认德国在历史上的罪责，1995年6月，科尔跪在以色列的一座纪念碑前谢罪，重申“我们内心充满羞愧”。^⑧其间，德国以巨额现金对纳粹受害者给予赔偿，为此已经支付赔偿950亿马克（约675亿美元），计划到2030年赔偿总额为1220亿马克（约866亿美元）。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说：“我们根据自身经验认识到，要面对过去是多么困难，但这是绝对需要的，其结果也有助于未来。如果历史成为压迫我们记忆的沉重包袱，那么它就应该给我们以精神启迪。能够铭刻在心的记忆，不仅仅是困难的事情，而且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只有接受过去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的全部遗产，并且负责地把它肩负起来，才能够把一个国民变成真正的国民。”^⑨

和德国相比，日本政界要人，对战争的反省态度，差之甚远。许多政要表示过“这场战争是侵略”（1982年12月），但在1985年却又以首相身份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有的刚刚承认“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随后在右翼势力攻击下，把侵略战争改为“侵略行为”（1993年8月）。有的仅仅表示“遗憾”、“悔意”等等。有的右翼政客公开表示，个别政治家——甚至包括首相，可以道歉，整个国家不能道歉。^⑩这样就出现了首相可以道歉，许多现职阁僚却毕恭毕敬地到“靖国神社”拜祭“昭和殉难者”的亡灵。首相表示道歉，许多现任阁僚却加盟反对“道歉”的“终战50年议员联盟”。更应指出的，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说：“以德国的经验来说，赔偿损失和给予补偿的行动，有时它比口头表态更重要而且更有效。”^⑪据统计，日本的赔偿数额仅仅约60亿美元，和德国的866亿美元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这个数目与中国所受的直接损失一千亿美元，间接损失5千亿美元，又如何相比？可是日本政府从1950年开始到1994年共向侵略战争中的国内战死者遗族提供了约38万亿日元的抚恤金，这是日本向外国支付的各种赔偿总和的57倍。^⑫既或政府承担了责任，如“慰安妇问题”的赔偿问题，也以“双方政府间已经解决了（赔偿）问题”为由，不但不以国家立场向这些身心遭受摧残的年迈妇女赔罪补偿，反而挖空心思地逃避责任，成立一个所谓“为妇女着想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简称“亚洲女性基金”），由国民认捐以充当赔偿。这种做法，甚至遭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调查团的非议。调查团经过实际调查，于1996年2月6日发表了《对女性施暴的报告书》，报告书中明确指明：“是一种非人道行为，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行为。”报告书中对日本提出六项“劝告”，包括“一、日本陆军所创设的慰安所制度违反国际法，政府应承认其法律上的责任；二、日本应对被抓来当性奴隶的受害者进行个人赔偿。……”。^⑬据有人估计，目前尚存于人世的被害妇女约有千余人（就是依据美国和加拿大赔偿战时被强制关进收容所的日侨，每人还赔偿200万日元），显然赔偿费用需要几十亿日元，而到现在收到

的捐款只有1.45亿日元，事实上日本企业界也绝不愿意“出钱赔罪”。与此相对照的是，日本政府为了救济在泡沫经济时代中因贷款给那些大炒地皮的不动产公司而损失惨重的农民团体，竟拨出5000余亿日元巨款。日本政府厚此薄彼的作法，难道不反映日本政要对战争受害者的心态!!^⑩

日本政府的作法，也遭到日本人民的反对。当前首相三木的夫人被拉来作为“亚洲女性基金”的发起人时，她还存有“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这些年事已高的受害者得到公平而迅速的赔偿。”然而，三木夫人对响应捐款的人寥寥无己，而日本政府又采取超然态度深感不安。^⑪于是，毅然提出辞呈，表示她“作为基金会发起人，迄今的努力却未能治愈军妓们的心灵创伤而感到惭愧，甚至彻夜难眠”。^⑫同时，东京的中野区议会也向政府提出：希望政府迅速彻底解决战时军妓问题。更令人气愤的是，时至今年6月，一再跳出来公然宣扬侵略有理的右翼政客奥野诚亮，竟说“从军慰安妇”是“商业行为”。这是对受害者的极大污蔑和恶毒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表示强烈的愤慨”，并且“要求日方采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不要再做伤害中国和其他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事。”^⑬

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半个世纪，但在日本国内颇具影响的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逆流，确实值得人们深思。这些右翼政要的“光明的日本”究竟是什么？是要再建一个现代版的“大东亚共荣圈”？事实上，没有认真的历史反省，不可能把日本引向“光明”的前途。面对着战后半个世纪的中国和亚洲各国经过巨大的历史冲击而又已经觉醒了的人民，重演军国主义旧梦是不可能的。魏茨泽克说得好：“真诚而坦率地面对过去对于同远近的邻居建立充满信任而又更为有助于国民利益的合作关系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如果不想或者也不能从历史角度对本国在战时的行为作出估价，……邻国就会认为你在政治上逻辑上缺乏判断力，就会把你看成是一个不知道你将意欲何为的危险国家。”^⑭

注释：

① (日)《朝日新闻》，1995年2月10日。

② (日)《朝日新闻》，1996年6月5日。

③ 《自民党内出现反对反省侵略战争的动向》，(日)《赤旗报》，1996年2月21日。

④ 《时事社》，东京1995年8月9日电。

⑤ 广川忠秀：《难以认错》，波兰《政治周刊》，1995年5月13日。

⑥ 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秘史》，第2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8月。

⑦⑨ 《赞美侵略战争的‘黑潮’》：(日)《赤旗报》1995年8月13日。

⑧ 黄影华：《为何日本总上演“失言闹剧”》，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11月19日。

⑩ 新华社东京1995年9月2日电讯。

⑪ 参见：金先予等《东京审判始末》，第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

⑫⑬⑭ 姜占国：《否定过去容易重蹈覆辙》，新华社1995年9月1日东京电。

⑬ (日)《赤旗报》1995年2月21日报道：《自民党内出现反对反省侵略战争的动向》。

⑭ 吉田裕：《日本人的十五年战争观与战争责任问题》，(日)《历史评论》1988年第8期。

⑮ 卓南生：《令人忧虑的日本‘亚细亚主义’》，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2月17日。

⑯ 日本津田塾大学副教授蔡史君：《文字游戏又一年》，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8月13日。

⑰ 参见角田顺主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二卷。

⑱ 林夕：《日本出现抹杀侵略历史倾向》，(日)《中国巨龙》1996年7月9日。

⑳ 参见：《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解放军出版